

第一課

中國文明起源的 科學探索

黃帝和炎帝：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
近世史家對炎黃傳說的認識
多源的文明・多元的文明
原始農耕經濟與文明進步

中國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之一。中國與世界其他文化體系比較，數千年來，歷史記載最為完整，歷史遺存最為豐富，歷史傳承關係也最為明確。

中國文明對於世界文明有重要的貢獻，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是，我們對於中國文明的起源，對於中國文明的早期形態的認識，仍然存在許多有待於進一步認真探索的課題。

一代代學者對於「探源」、「尋根」的探索，使我們的認識向科學的方向推進，借助考古新發現及其研究，我們今天對中國文明起源的認識已經逐漸接近歷史的真實。

一、黃帝和炎帝：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

《史記·五帝本紀》記述了黃帝軒轅、帝顓頊高陽、帝嚳高辛、帝堯放勳、虞舜重華的事蹟。實際上司馬遷關於早期文明時代以前的歷史的理解，都反映在關於「五帝」的生動記敘之中。司馬遷明確說到有關「五帝」的文字來自有關文獻記載，而又與民間傳說往往一致。他寫道，自己曾經西到空桐一帶，北至涿鹿地方，東方則走到海濱，南方又航行於江淮，所到之處，訪問當地長者，都傳誦黃帝、堯、舜故事，雖然文化淵源不同，地方風教有別，有關先古聖王的傳說，大體脈絡是相同的。可見「五帝」傳說很早以前就已經流布。

據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的記載，在「軒轅」所處的時代¹，各個部族相互「侵伐」，百姓受到殘害，軒轅於是習武行兵，征討好興不義之戰的部族，受到天下的擁戴。在相繼戰勝炎帝、蚩尤兩大部族集團之後，各地諸侯都尊奉軒轅為天子，是為「黃帝」（圖1）。

黃帝族和炎帝族是史前兩個關係密切的大氏族部落。炎帝氏族部落衰落的時候，黃帝氏族部落強大起來。關於炎、黃的關係，《國語·晉語四》記述：「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按：濟讀為排擠之擠）也，異德之故也。」依此說，炎帝與黃帝同出於少典氏族。炎帝族所在姜水是渭水的一條支流，在今陝西寶雞市境內。黃帝族所在的姬水是現今哪一條河流尚無定論，但應距姜水不遠。因而可以推測，炎黃兩個氏族部落發祥於我國西北黃土高原地區²，後來向中原地區發展。黃帝時代，中國史前社會發展取得偉大成就。黃帝時代開始馴養使用牛馬，發明了車船，學會打井和養蠶繅絲。黃帝時代發明了文字，制定出曆法和甲子，發明了冠冕衣裳。中華民族制度文明發端於黃帝時代。炎帝時代主要貢獻在原始農業和原始文化方面。傳說炎帝神



圖1 軒轅黃帝像

農氏尋求治病的藥物時遍嘗百草，發明醫藥是炎帝神農時代的又一重大成就。

對於中國文明起源時代的部族、部族集團或者部族聯盟，有的學者認為除了黃帝和炎帝之外，還有蚩尤。也有的學者認為，和黃帝、炎帝並列的部族集團或部族聯盟是苗蠻³。對於這一階段的歷史文化分析，認識不能一致，是因為有關傳說時代的文字遺存本來就零散、片斷而且未能確信的緣故。

在探索史前文化的面貌時可以發現，時代越古遠，則當時不同群落間的文化差異也越明顯。甚至同時代相距不遠的人類所居住遺址的出土物，也具有各自相異的鮮明特徵。只是經過人類長期的交往和溝通，不同的文化遺存才逐漸顯現出越來越突出的文化共同性。

傳說中黃帝「度四方」以致「萬國和」的事蹟，正是和文明進步的這一規律相吻合的。

二、近世史家對炎黃傳說的認識

從晚清時代起，進步的中國知識界在接受西方文化影響的同時，對於中國傳統文化開始反思。20世紀20年代初，以「古史辨」為旗幟的疑古思潮興起。這一思潮當時對於摧毀正統歷史體系的構成，對於衝破封建文化傳統的網絡，從而解放民族精神，具有積極的意義；對於史學革命，也表現出重要的推進作用⁴。

「古史辨」派的創始人顧頡剛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他認為，古史傳說中的帝王都有神性，都是從神演化為人的，古書中所講的古史，是由不同時代的神話傳說一層一層地積累起來的，神話傳說發生時代的先後次序，也和古書所記載的古史系統排列的先後恰恰相反。「時代越後，傳說的古史期越長。」「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等。」而且，「時代越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越放越大。」「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堯典》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範了。」⁵

顧頡剛的見解一發表，隨即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許多年後，顧頡剛在〈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一文中回顧當時的情形，有這樣的說法：「哪裡想到，這半封題為〈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的信一發表，竟成了轟炸中國古史的一個原子彈。連我自己也想不到竟收著了這樣巨大的戰果，各方面讀些古書的人都受到了這個問題的刺激。因為在中國人的頭腦裡向來受著『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的定型的教育，忽然聽到沒有盤古，也沒有三皇、五帝，於是大家不禁譁然起來。多數人罵我，少數人贊成我。許多人照著傳統的想法，說我著了魔，竟敢把一座聖廟一下子一拳打成一堆泥！」⁶

顧頡剛「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論點一提出，確實在學界掀起了一場風暴。錢玄同認為這是「精當絕倫」的意見，「看了之後，唯有歡喜讚歎」⁷。胡適後來也表示：「顧先生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見解真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我們應該虛心地仔細研究他，虛心地試驗他，不應該叫我們的成見阻礙這個重要觀念的承受。」⁸然而，學界也多有反對的意見。顧頡剛在回答批評者的種種詰難時，又繼續充實提煉自己的理論。他在 1923 年 7 月 1 日又發表〈答劉胡兩先生書〉，提出在推翻非信史方面，應當有四項標準：第一條標準是「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第二條標準是「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第三條標準是「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第四條標準是「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顧頡剛表示：「以上四條為從雜亂的古史中分出信史與非信史的基本觀念，我自以為甚不誤。」⁹

近幾十年來層出不窮的考古新發現，使學界逐漸認識到疑古思潮的許多觀點應當有所修正。對於古史傳說的認識，於是又有更新。徐旭生曾經在《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中指出：「在早期發展的各民族（用這一詞的廣義）中，它們最初的歷史總是用『口耳相傳』的方法流傳下來的。」徐旭生還說：「傳說時代的史料和歷史時代的史料在性質上主要的不同點，為前者的可靠性比後者的可靠性差。」除了「口耳相傳的史實」「容易失真」外，「並且當時的神權極盛，大家離開神話的方式就不容易思想，所以這些傳說裡面摻雜的神話很多，想在這些摻雜神話的傳說裡面找出來歷史的核心也頗不容易。由於這些原因，所以任何民族歷史開始的時候全是頗渺茫的，多矛盾的。這是各民族共同的和無可奈何的事情。」然而，徐旭生又指出：「很古時代的傳說總有它歷史方

面的質素、核心，並不是向壁虛造的。」¹⁰這樣的認識，應當是符合我們已經獲得的關於史前史的知識的。

自戰國秦漢時期以來，古史傳說時代的「三皇五帝」事蹟已經成為當時歷史結構的最初框架。古史系統中的五帝傳說和三皇傳說，雖然「古史辨」派的史學家們早已指出了其中後人增飾的痕跡，因而斷定其為偽古史。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在這些傳說中也許隱含著真實的歷史的若干遺存。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一書中談到傳說時代的人物和傳說時代的歷史時曾經說：「無論羅馬那七位所謂的國王究竟真有其人或是神話人物，無論歸功於他們的任何立法活動究竟實有其事或是出自虛構。」其實都「無關緊要」，「人類進步的事件不依靠特殊的人物而能體現於有形的紀錄之中，這種紀錄凝結在各種制度和風俗習慣中，保存在各種發明與發現中」¹¹。從這樣的認識出發，我們考察文明起源與「三皇五帝」古史系統的關係，就可以排除若干疑慮，深入探索傳說背後所體現的歷史真實。

一些學者認為，結合考古學的新成就，我們對於炎黃二帝的傳說應該有新的理解。有不少學者認為，從伏羲、神農到黃帝的古史傳說，表現了中華文明的萌芽最初發生和早期發展的過程。李學勤在〈論古代文明〉一文中指出：「《史記》一書沿用《大戴禮記》所收〈五帝德〉的觀點，以黃帝為《五帝本紀》之首，可以說是中華文明形成的一種標誌。」黃帝設官置監，迎日推策，播殖百穀，馴化鳥獸的事蹟，已經表現出早期文明的特點。「因此，以炎黃二帝的傳說作為中華文明的起源，並不是現代人的創造，乃是自古有之的說法。」李學勤還說道：「黃帝、炎帝代表了兩個不同的地區，一個是中原的傳統，一個是南方的傳統。這種地區的觀念對我們研究古史傳說頗有意義。」¹²我們讀《史記·五帝本紀》，可以看到，司馬遷追述古史，大體是以中原文化系統為中心的。但是確實也涉及南方文化系統的歷史存在。

三、多源的文明・多元的文明

「古史辨」派在推翻非信史方面，提出了四條標準：第一條標準是「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第二條標準是「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

念」。經考古資料印證，可以確定地說，這兩條標準，體現出了對於中國文明起源的科學認識。

近年的考古收穫確實可以證明，「中華文明」「剛在萌生的過程中，便有了頗為廣泛的分布」。以往通常將黃河中下游地區看作「一元」的早期文明誕生的基地。然而我們看到，在黃河中下游以外的地區，在新石器時代已經有相當繁盛的原始文化發育。

20 世紀 20 年代初，瑞典考古學者安特生在甘肅臨洮馬家窯發現了一處以發達的彩陶藝術作為重要特徵的原始時代遺址。後來，黃河上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考古學文化，就因此被命名為馬家窯文化。馬家窯文化較集中地分布於甘肅省，其地域大致以隴西平原為中心，東起隴東山地，西抵河西走廊。甘肅北部、甘南山地以及寧夏南部和青海東北部，也曾經發現馬家窯文化的遺址。馬家窯文化是仰韶文化的一個地方分支，所以又被稱作甘肅仰韶文化。

馬家窯文化的彩陶在陶器總數中約占 20%至 50%，隨葬品中的彩陶有時甚至多達 80%以上。在中國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彩陶文化中，馬家窯文化的彩陶所占的比率最高。與其他文化系統的彩陶相比，馬家窯文化的彩陶繪製的風格以繁縟多變為主要特徵，同時又具有明顯的規律，可見馬家窯人的繪彩技術已經達到了相當成熟的水平。馬家窯彩陶繪彩的部位也比其他彩陶文化廣泛得多，許多細泥陶的外壁和口沿布滿花紋，甚至一些大口徑器物的內壁和其他夾砂的炊器上也常常繪彩。馬家窯文化彩陶的圖案多取材於自然，以魚紋、鳥紋、蛙紋、蝌蚪紋、水波紋、草葉紋、葫蘆紋等較為多見，並且多有各種由這些紋樣變形而形成的圖案，以及不同形式的幾何紋等。馬家窯文化彩陶的精緻與華美，表現出製陶工匠們不同尋常的工藝技能。在馬家窯文化的時代，燒製陶器的陶窯窯室都呈方形，與中原仰韶文化多為圓形窯室明顯不同。甘肅蘭州東郊白道溝坪遺址發現了一處規模相當大的製陶窯場，計有 5 組 12 座陶窯，此外還有一些被破壞的陶窯殘跡。窯場中還出土研磨顏料的石板和配色調料用的陶碟，都是當時陶工描繪彩陶紋飾的工具。發現的陶碟有分格，格中可以看到配有紫紅色顏料。

青海大通上孫家遺址曾經出土一件以舞蹈者的形象作為彩繪圖案主題的陶盆。畫面分為 3 組，每組各描繪 5 人攜手起舞，步法從容，體態輕

盈，動作齊整。每組外側兩人的一臂畫成兩道，可能反映不相牽握的手臂動作幅度較大或者擺動較為頻繁。舞蹈者每人下半身後的線條，有人解釋為一般飾物，有人解釋為飄動的腰帶，有人解釋為模擬鳥獸所裝戴的尾飾。關於原始舞蹈的最初起源，人們自然會想到《尚書·益稷》中所謂「笙鏞以間，鳥獸蹯蹯，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的記載。當時人們奏響用竹木簡單加工而成的笙簫，輕重有致地敲打著較為平薄的石器（應當就是古代樂器「磬」的原型），模仿鳥獸的動作翩翩起舞。「鳥獸蹯蹯」、「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等文字，記錄了這種舞蹈和原始狩獵生活的關係。這樣看來，或許上孫家彩陶畫面舞蹈者裝戴類比鳥獸的尾飾的說法，是接近歷史真實的。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中國古代典籍中可以看到「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為歌舞」（《山海經·海內經》）的傳說，認為最早的歌舞的發生，和中原先古聖王的事蹟有關。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關於原始舞蹈的實證資料，卻多是出自西北邊遠地區的文物遺存。

與上孫家舞蹈紋陶盆時代相近的出土文物中，還可以看到一些原始樂器。青海民和陽山馬家窯文化遺址曾經出土 2 件陶鼓，中間為筒形，一端呈罐狀，另一端擴展呈喇叭形，兩端各有一環紐，可以繫繩掛在身上拍擊，其中一件腰部還有一圈使用時繩勒的痕跡。呈喇叭形的一端有乳形小鉤及鑽孔，推測當時可能是用來繃獸皮的。《世本》記載：「夷作鼓。」可能最早的鼓的發明，正是少數民族的文化貢獻。青海樂都柳灣墓地出土的陶哨，可以吹出 4 個高低不同的音。

甘青地區的原始文化，尤以陶塑藝術造形之優美和技巧之純熟特別引人注目。甘肅秦安大地灣出土的以圓雕人頭像作為器口的陶瓶，腹部破裂處有黏接的痕跡，表明當時人對於這件器物的珍視。圓雕人頭像造形生動，刻畫細緻，髮式的表現非常具體，除前額為整齊的短髮外，兩側及後部都是披髮。甘肅天水柴家坪也曾經出土類似的器口為陶塑人物的器物。青海樂都柳灣墓地的出土物中，也有人像彩陶壺，多在器口塑有人面。其中 1 件塑繪有裸體人像，先捏塑人體的各個部位，然後用黑彩勾勒。頭面也在壺的頸部，五官清晰，披髮。身軀在器腹部，乳房、臍、下部及四肢袒露。上肢捧腹，五指分明，下肢直立。這類器物的文化內涵，我們至今還未能完全理解，但是其構思和製作所體現的藝術觀

念，確是值得重視的。

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的遺存，有男女合葬墓，被認為是一夫一妻制家庭形態開始確立的標誌。男女隨葬品的差異，又表現出兩性間社會分工的差異。隨葬品數量、質量和種類的差別，說明當時社會貧富逐漸分化，原始公有制社會正在逐步走向解體。

繼馬家窯文化之後，黃河上游西北高原的原始人群進入了青銅時代。甘肅武威皇娘娘臺和甘肅永靖大何莊等齊家文化遺址中出土了早期紅銅器和青銅器五十餘件。種類有刀、錐、環、匕、斧、鑽、鏡等。甘肅廣河齊家坪遺址出土的器身較厚重的銅斧，是齊家文化銅器中最大的一件標本。銅鏡共發現 8 件，其中青海貴南尕馬臺 25 號墓出土的 1 件保存較好。圓形，直徑 9 公分，厚 0.4 公分，一面光平，一面飾有七角星形紋，邊緣有一周突棱，分析其製作工藝，當已採用合範鑄造手段。經快中子放射分析，銅錫之比為 1:0.096。原鏡紐後已殘壞，在鏡緣的一側鑽有 2 個小孔做繫繩穿掛之用。

迄今發現的齊家文化的墓地大都是成片的氏族公共墓地，其規模應當與當時氏族或部落的規模相適應。墓葬一般都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和銅器等作為隨葬品，尤以陶器為大宗。還有以豬和羊的下顎骨隨葬的。從一些墓地的發掘資料分析，齊家文化的墓葬規模和隨葬品質量和數量的差別相當懸殊。如甘肅武威皇娘娘臺墓葬的隨葬器物，陶器少者不過 1 至 2 件，多者可達 37 件；玉石璧少者 1 件，多者至於 83 件。在甘肅永靖秦魏家和大何莊兩地的五十多座墓葬中，隨葬的豬下顎骨總數多達五百五十多件，少者 1 件，多者 68 件。這些跡象，說明了死者生前財產擁有數量的不均和社會地位的差別。

生產的發展，特別是以冶金業為主導的手工業的發展，促使齊家文化的創造者們開始邁上了文明的初階。

在齊家文化墓地還發現 6 處所謂「石圓圈」遺蹟，就是利用大小相當的天然礫石排成直徑約 4 公尺的圓圈，作為某種宗教祭祀活動的場地。甘肅永靖大何莊的一處「石圓圈」，西北方向還留有寬 1.5 公尺的缺口。「石圓圈」的附近都分布著許多墓葬，還發現有卜骨和牛、羊等動物的骨骼。宗教祭祀行為受到重視，說明文化的進步達到了新的階段。

齊家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肅、青海境內的黃河沿岸及其支流渭河、洮

河、大夏河和湟水流域。在寧夏南部和內蒙古西北部也有零星發現。其分布地域，大致是中原人稱為「西戎」的部族的早期活動範圍。

青海樂都柳灣齊家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石磬，是同類器物中年代最早的 1 件，是研究中國音樂史珍貴的實物資料。柳灣還出土了 36 枚海貝，說明齊家文化的先民們和相當遙遠的地區保持著經濟文化的往來。

因首先發現於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而得名的河姆渡文化是中國長江下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河姆渡文化的分布範圍包括杭州灣南岸的寧（波）紹（興）平原，又越海東抵舟山群島，年代大致為西元前 5000 年至西元前 3300 年。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製作技術得到比較突出的發展。骨製耜（圖 2）、鏃、魚鏢、錐、針、匕、鑿等，廣泛應用於生產和生活領域。另外，骨製筭、管、墜、珠等裝飾品，造形精巧，磨製光潤。有些骨器上，雕刻有細緻精美的花紋，體現出製作工匠的精湛技藝。

位於上海青浦縣城東約四公里處，地處太湖地區的崧澤遺址，以內涵為新石器時代遺存的中層堆積最為豐富。有人稱之為崧澤類型或崧澤期，有人稱之為崧澤文化。其年代大約為西元前 3900 至前 3300 年。同類遺存，又見於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張陵山遺址、江蘇常州圩墩遺址、浙江吳興邱城遺址等。

崧澤文化的石器一般都通體磨光，以穿孔石鏹、長條形石鏹等較有特色。從生產工具的形制和陶器羣和料多使用稻殼可以推知，當時的經濟生活以稻作農業為主。



圖 2 河姆渡骨耜農具